

# 首席质量官应与企业经济利益脱钩

据报道,为加强产品质量监督工作,国家质检总局已培训了首席质量官 2142 人,在 900 余家大中型企业建立了首席质量官制度,而今年将在大中型骨干企业推广设立首席质量官。

作为一种新的企业质量管理制度,“首席质量官”的设立和推广无疑是一种进步。企业是质量安全管理主体,但法人代表往往精力有限,设立首席质量官,可以专门性的对企业从原料进厂、产品生产、出厂检验层层把关、整体把关,较大幅度提高企业质量安全管理水平。

但同时也应意识到,首席质量官的设立还仅仅只是第一步,更关键的是,在生产实践中,政府和企业如何用好首席质量官。

就企业而言,首席质量官不能成为应付检查的摆设。随着全球化的推进,企业的商品供应链正变得越来越长,这也使得企业的质量问题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与复杂,以最近欧盟发生的“挂牛头卖马肉”事件,两家屠宰场出产的马肉,通过供应链条进入市场,最后竟波及 16 个国家,甚至还包括远在亚洲的中国香港。在这种现实下,传统技术技能型的质量经理实际上已经很难胜任质量监督工作,即便从企业的长远发展来看,也需要真心实意地把质量管理交给层次更高的专家,给予更高的地位。他们不但是质量大师,还应成为商界领袖人物。

而从政府来说,要让首席质量官制度真正发挥作用也需顾及企业的真实感受。在现实中,所有管理完善的企业都已经拥有自己的产

品质量监督管理者,如何说服他们真正接受明显高一层级的“首席质量官”不是那么简单,首席质量官要承担更大的质量责任与风险,这意味着待遇也将相应提高,这都是“额外”的支出,一些企业势必会产生抵触心态,如疏解不当,一味依靠行政命令推广首席质量官制度,则很容易使之沦为一张空文。

首席质量官不但是一个岗位,更应是一种健全的制度和机制。企业一旦发生质量事件,轻则赔款,重则破产,对此,企业天然的具有遮掩冲动,在这种情况下,如何保证首席质量官不效忠企业利益而忠于公众利益?

因此,要用好首席质量官就必须落实两个关键。其一,首席质量官的质量问题“一票否决权”应获得相应的外部保障,使质量官们有勇气行使否决权,不至于因为尽责行使否决权而招致报复;其二,首席质量官应尽量与企业经济利益脱钩,成为一个更独立、专职、专责的岗位。如果这两点无法保障,即便设立首席质量官也很可能成为另一个“工会主席”,或者被企业老总们在质量事故后推出的挡箭牌。

首席质量官制度的推出,为中国解决产品质量问题提供了一个契机,但指望首席质量官制度毕其功于一役也是不现实的,要从根本上提升中国制造的质量,尤其是解决食品安全问题,还要依靠全社会的共同努力,包括:企业自我约束、行业诚信自律、政府有效监管以及全社会成员的广泛参与。

(转载自《新京报》)



## 义卖被骗

□ 文/杨国栋 图/朱慧卿

为给贫困山区孩子捐赠衣物, 郑州 13 岁的晨晨(化名)和同学到街头卖花,不料遭遇骗子。“夜里 3 点,孩子还在梦中哭着喊‘还我钱、还我钱’”,愤怒的家人表示要设法找到骗子,“只要骗子出来道歉,我愿意给他 1 万元钱!”

晨晨为收到假币痛苦可以理解,但因此质疑网上有关贫困山区孩子受苦的真实性,不愿再参加此类活动,未免有点因噎废食。家长要做的不应是想方设法让骗子主动道歉,而是教会孩子如何分辨真假,别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,把所有人都当成骗子来防。义卖这样的爱心活动本身与骗子的行骗没有任何关系,可恶的是骗子,不是义卖。只要提高警惕,学会如何分辨假币,就不会轻易上当。

孩子义卖收到假币深受刺激,甚至在梦中哭着喊“还我钱、还我钱”,父母和老师也有一定责任。由于平时很少向他们讲述社会的阴暗面,不仅使他们过于轻信他人,以致受骗上当,无形中也使他们首次受骗的经历更加痛苦,始终难以走出这一阴影。让孩子接受挫折教育也不是什么坏事,有助于他们更好地成长。

义卖收到假币,也不是只有孩子才会遇到。成年人组织的此类活动,同样经常面临假币威胁。只要收现金,就很难避免有人使用假币,别指望义卖能够例外。比如去年年底广州外国领馆为中国残疾儿童筹款义卖,就曾收到 5000 元假币。

义卖前针对可能出现的假币应做好防范工作,学习反假币知识,学会如何分辨假币。学校也要加强反假币知识宣传教育,增强青少年识别假币的能力,防止他们沦为假币诈骗的受害者。

## 海南旅游乱,乱在职能部门

□ 王琳

每逢春节假期,吐槽海南旅游市场似乎成了惯例。近日,央视等多家媒体再次聚焦海南零团费、导游高回扣等问题。虽然年年曝光,却依然看不到此乱象有望终结的迹象。

零团费并不是海南旅游的特产,云南、港澳等热门旅游目的地都曾深受其困扰。国家旅游局早在 2007 年就部署过针对零团费的严打,但收效甚微。

查禁零团费并非无法可依,2009 年新修订的《旅行社管理条例》就涵盖了诸多整治零团费的细则, 国家旅游局也曾在 2011 年发布的《关于加强监督管理规范旅游市场秩序的工作意见》中,明确要求业界摒弃以零团费等招徕游客的模式,“若出现诱导、强迫游客购物和参加另行付费旅游项目的违法行为将受到严肃处理”。

在网上稍加搜索,不难找出旅游部门为零团费开出罚单的个案,但比起明滋暗长的零团费来说,发生数与处理数着实相差悬殊。至少在业界,早已对零团费见惯不怪了。那少数被罚者,也多被认为是“隔墙扔砖”砸中的“倒霉蛋”。零团费禁令虽被三令五申,但无视者众。

按理说,零团费并不难识破。游客在报团时,面对零团费难道就不曾怀疑?团费里的“坑”终究要游客来填——或增加自费项目,或在购物点多逗留。只要在出行前做做功课、查查攻略,自然知道哪些购物点的“特产”不能买,哪些

自费景点不可去。但问题是,游客并非都是经验丰富的驴友。既然是报团出游,自然多停留在浅层次的观光游上。而报团游又是一个很少回头客的服务市场,一些不良旅行社因此展开“先骗来再宰”“能宰一个是一个”的恶性竞争。

其实,零团费屡禁不止的根源不在“团费”高低,而在旅游市场的欺诈消费和强迫消费之横行。单纯从旅行社和导游入手,去遏制旅游乱象注定难有成效。因为零团费的根不在旅行社,而在诸多不良景区及购物点。试想,要是没有自费景点和购物点的高额回扣,又怎会有零团费?

因此,对零团费的查禁不能期待旅游部门的“独家行动”,而要多部门齐头并进、协同执法。旅游市场中的欺诈消费和强迫消费,不仅关乎旅游部门,更关联着众多执法部门,如工商、税务、物价、质监、公安等等。如若各职能部门均能依法履责,又怎会发生价格欺诈、强迫消费?

当然,畅通旅游纠纷投诉和处置渠道,也是遏制旅游乱象的必要举措。一些欺诈消费和强迫消费之所以发生,就是看准了游客通常日程安排较固定,经不起投诉或诉讼的折腾。如能运用好旅游巡回法庭等司法创新,快捷受理并快速处理旅游纠纷,就能大大提升违法成本。

旅游是典型的发生在陌生人之间的社会关系,对法治文明的依赖更高。旅游乱象的遏制,也需要一个真正实现了严格执法和公正司法的法治环境。

## 贪官出狱,官员和富商们为何列队迎接?

□ 肖畅

近日微博上出现一则爆料:2006 年因贪污受贿被判入狱 11 年的前山西省副书记侯伍杰,于近日提前出狱,当地官员和煤老板及名流富商们争相迎接,或列队欢迎,或鲜花簇拥,侯伍杰出狱竟成“荣归故里”。

迎接侯伍杰的有官员,有煤老板,也有名流富商,可谓有权的、有钱的、有势的各有所代表,精英权贵纷纷向他聚拢。示好、欢迎、簇拥之状竟如等待英雄般的突出。这是一般人无法享受的礼遇,没有特殊的名望、魅力抑或能量,无法扮演这样的“英雄”。而且,侯伍杰竟只是刚出狱的官员。惟其如此,令人震惊。

这则爆料尚未得到核实,一些疑问需要澄清。侯伍杰和这些夹道欢迎的人有何关系?他们显然不是侯伍杰的亲属。如果是亲属,接回一个出狱的亲人,不能视为反常。那是不是朋友?如果真是出于朋友之情,那这个感情非同一般。这快要超越了一般的利益团结,更像是性命之交,江湖情义展露无遗实在可怕。

一种说法是,侯伍杰独自承揽了一切罪名、负担,虽然入狱,却没“咬”出其他的人,如果是这样,那么各界人物列队欢迎他出狱,恐怕就不是什么友情,对他的“荣归”纷表恭敬的背后,都隐藏不能为外人道的心思。

这些疑问,无不指向了官场,指向了一种政治现实。这些年,人们已经从各个窗口看到了政治现实中的光怪陆离的丑态。有

的贪官在狱中可以领工资,有的坐牢出狱还有人送补偿费,现在,人们对官场的想像,可以说再次被这个夹道欢迎的戏剧场景颠覆。侯伍杰所享受的欢迎,在法律上、纪律上都不成问题,没人能阻碍他的“荣归”。但这个场景刺人眼球,其释放的信息、展现的氛围让人侧目,人们看到官员、煤老板、富商仿佛结合成一股牢固的关系,他们相拥在一起,尽管真假难分,却暧昧异常,已经分不清彼此。

夹道欢迎,是很高调的,好像大家都觉得本该如此,无需任何忌惮。人们怎么看,如何评说,这些都不足道了,一切都大大方方,烘托着侯伍杰的“英雄”形象,灰色的关系以礼赞的方式得到展示。好似江湖大佬被簇拥、欢迎,气氛越是热烈,越显张扬。这种坦然的态度从哪里来?各色人群,迎接这样一位出狱的官员,难道用不着遮遮掩掩?台面上都这样了,台下又该是怎样的场景?官场背后的生态,可能更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。

对于爆料,山西方面有必要调查并回应。这样的信息,传递的不是什么正能量,而是对权力系统负面的甚至是破坏性的能量。不健康、污浊、沆瀣一气的现状,侵蚀、消耗公众对政府的信任,不断加深公众对权力的疑虑和不满。如果说一个因贪腐入狱的官员,可以聚拢遍布权贵阶层的人们为之庆贺、欢迎,或者反过来,权贵阶层的人们竟然以堂而皇之、肆无忌惮地阵仗迎接官员出狱,无论出于何种关系、原因,这样的政治现实让人担忧。

## “炫富”、“仇富”不能从娃娃开始

□ 温国鹏

近日,跟着父母到那台姥娘家拜年的一名 10 岁孩子,拿着 4000 元压岁钱在超市购物时跟同龄孩子炫富,招致几名同龄孩子的殴打。

说实话,我们没有理由对孩子们报以过高的要求,更不可能不切实际地希望他们小小年纪便视金钱如粪土。但我们理由希望,他们不要把炫富表现得如此明显,把仇富演绎得如此淋漓尽致。的确,这样的事或许仅仅是个例,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个例中感受到教育的失败:孩子们之间的炫富与仇富到底是和谁学的?

把钱作为一种炫耀的资本,这本来是成人世界才会出现的病态现象。现在,这种现象也出现在孩子们中间,我们首先应该做的是自我批评。说白了,这些成人世界的东西侵入了孩子们的生活,并非是孩子们太早熟,而是成人

自己做的不够好。如果没有大人的言传身教,本应是单纯无邪的孩子不会有这样极端的表现。如果孩子们已经习惯了身边大人在言谈举止中对钱财的崇拜,对他人财富的“羡慕嫉妒恨”,那么,我们又如何能阻止孩子们有样学样?当我们越来越希望用压岁钱和物质来表达对孩子的爱时,甚至是如何教育孩子,更重要的仍是我们每个人自己的财富观念健不健康。只有我们自己有着对于金钱的合理态度,才可能找到合适的方式对下一代言传身教,进而帮助他们正确地认识金钱在生活中的价值。